

金代战争与文学

□ 胡传志

安徽师范大学 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安徽 芜湖 241002

金王朝在百余年的历史中,先后与北宋、南宋、蒙古、西夏交战,战争时间之久,地域之广,灾难之重,实属罕见。许多文人卷入其中,写下了百余篇与战争相关的诗词文,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独特性。

大规模的战争往往会催生出一批文学作品。12世纪前半叶的宋金战争,使南宋文学发生巨变,推动了爱国主义文学的大发展,而金国文学则相对沉寂。天会三年十月,金太宗第一次伐宋,此后,金兵多次南下,与南宋交战,互有胜负。皇统元年底,金、宋双方签订“绍兴和议”。

虽然金王朝在战争中大获全胜,这期间的战争文学却相当暗淡。各帅府中有一批随军汉族文人,可以为女真帅府写一些不用署名的军事外交文书,但未必能从攻城略地的侵宋战争中获得喜悦,所以无论从感情上还是理智上,皆难以创作出以抒情言志为主的文学作品。诗词之外,有几种史料文献传世。《大金吊伐录》(编者未详)纯粹是当时外交文献和有关资料的汇编,缺少文学性。阿懒《大金武功记》原书已佚,金人李天民《南征录汇》征引十余则,从中可见其性质类似日记。可恭所编《宋俘记》序文,完全站在金王朝的立场上,歌颂“汴宋一役”的卓著战功,谴责宋徽宗、宋钦宗的暗昧失信,进而质疑宋太祖、宋太宗建国的正当性,措辞严厉。

在之后的战争中,战争文学的发展稍有变化。蔡松年曾两度随军南下。天会十二年,首次入完颜宗辅的元帅府,因金太宗病危撤兵。这期间,蔡松年有三首词作传世,但都没有正面叙写战争。天眷三年五月,蔡松年再度随军南侵,他的《庚申闰月,从师还自颖上,对新月独酌十三首》刻意避开所有战争因素,直到最后一首诗,仍深陷矛盾之中,期盼能早日饮酒自乐,啸傲山野。在其他诗中,也可看出蔡松年“却视高盖车,身宠神已辱”“到家问松菊,早作解官计”之类心理矛盾。这些足以说明蔡松年对宋战争缺少热情。七月,战争结束,蔡松年回到祁州(今河北安国),写下长诗《七月还祁》,抒写从前线回到后方的无比喜悦之

情。蔡松年不写出兵和参战,内心反对战争,身处后方的其他文人更是无视战争。这说明,并非所有的战争都能推动战争文学的发展。

正隆六年九月,海陵王完颜亮发动了第二次对宋战争,十一月,完颜亮准备由瓜州渡江,被部下耶律元宜所杀。大定三年正月,金世宗整顿力量,再次派兵南下。大定四年十二月,双方签订“隆兴和议”。

在完颜亮南伐过程中,汉族文人一如金初,集体失声。完颜亮成了战争文学创作的主帅。这一时期战争文学作品几乎全部为完颜亮所作。由于完颜亮既是野心勃勃的最高统帅,又是充满激情的作家,因此其作品与其他战争文学有显著区别,其鲜明特征有三:

一是“理直气壮”,豪迈自负。完颜亮将其非正义的侵略行径伪饰为吊民伐罪的正义战争。其在即位之初,即宣称“天下一家,然后可以为正统”。到达扬州时,他写下《南征至维扬望江左》诗:“万里车书尽会同,江南岂有别疆封?提兵百万西湖上,立马吴山第一峰。”这种自信豪迈不仅源于他的强大军事力量、雄强横暴的个性,还源于他所认同的华夏一统的价值观。同时期所作《临维扬》扬言“鞭梢点尽长江水,不到吴山誓不归”,表现出的自负与其女真帝王身份有关,诗作体现出帝王之气。

二是激励部将,高歌猛进。完颜亮帝王兼军事统帅,一方面,他有意避开战争的残酷性,另一方面,他将其诗词特长应用到战争动员与组织之中。韩夷耶率领射雕军和围子细军拿下两淮之后,向江南进发,完颜亮特作《喜迁莺》为其壮行。完颜亮可以任意夸赞韩夷耶将军如何勇武过人,也可用功名富贵激励韩夷耶,奋勇作战。

三是超越敌我,称赞对方英烈。战争期间,敌我分明,不会轻易留下同情或称赞对方的文字,但完颜亮无此顾虑。南宋建康统帅官姚兴寡不敌众力战而死。完颜亮听闻他的壮举,当即写下悼诗,充分肯定他对宋王朝的“忠孝”品质,透出对英勇将领的赞赏,

体现他尊重对手的英雄怀抱。在完颜亮南侵过程中,还有一首罕见的饶有趣味的诗作:“垂杨传语山丹,你到江南艰难。你那里讨个南婆,我这里嫁个契丹。”在女子看似轻松鲜活的话语中饱含款曲、辛酸与沉痛,让世人在完颜亮高亢的进军号角中还能听见来自大后方低回的歌吟,从而见证此次战争给南北民众带来家室分离的巨大不幸。

隆兴和议之后,金王朝迎来了四五十年承平时期,所谓“大定明昌五十年”。盛世的危机也在潜滋暗长,武备越来越松弛。金章宗统治后期,先后与南宋、蒙古、西夏展开三次战争。金王朝由侵略者变为被侵略者,战争的性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,此时战争文学十分活跃,并出现了一些重要新变。文人对战争的态度由金初的冷眼旁观转为积极的支持。参与战争的文人数量明显增多,创作的水平也大幅提高,此为新变之一。在南线战场,赵秉文参与秦和南征,他写作公文的同时创作了《通许道中》《庐州城下》《辕门不寐》等多首诗歌。他的《庐州城下》受到王维《观猎》等边塞诗的影响,颇有点盛唐气象,《辕门不寐》有长途奔袭的劳累和厌倦,有对家乡亲人的思念,更有早日一举消灭南宋军队、结束战争的期望。在北线战场,周昂参加抗击蒙古的战争,写下了多首反映边塞风土人情、征程劳顿以及战争失利等军旅生活的诗歌。如《翠屏口七首》作于战败之际,充满着担忧、愁苦、伤心,其根本原因在于金兵战败,国土沦丧。可见,战争形势是诗人心情、诗歌风格和诗歌境界的决定性因素。

在多方交战中,有的文人投身于战事,建立战功,有的文人为国捐躯,此为新变之二。在对西夏战争中,韩玉任凤翔总管判官,后来中都被围,韩玉联合关中其他力量,准备“勤王”,后被人诬蔑,冤死狱中。他的勤王檄文言词忠壮,激动人心。在对蒙古战争中,周昂“以边功得复召”,王扩守卫太原,蒙古来犯,其他城池失守,而太原得以保全。数十年后,郝经赋诗称赞王扩:“乾坤翻覆见忠节,臣子危亡置死生。一柱数年支大厦,孤军千里重长城。”足以见出王扩功勋卓著。

另有一些文人虽未参加战争,却以各种方式发挥了积极作用,此为新变之三。路仲显将南宋赠给他的“金二百五十两、银一千两”捐献出来,用以支持对蒙古战争。刘中曾随军南伐,充当文书兼参谋的角色。冯璧受金章宗之命撰写《招宋吴曦诏》为劝降吴曦发挥了积极作用。另有文人为金王朝伐宋将帅摇旗呐喊,刘昂主动创作《上平西》词,为副元帅纥石烈子仁助威。

金章宗后期至卫绍王时期烽火连年,文人们主动从戎,标志着文人们对金王朝的逐渐认同。尽管这一时期金王朝由盛转衰,但战争文学却比金初活跃得

多,创作水平也在提高。

金末三面受敌,文人们对不同方向的战争表现出不同的态度,出现了由关心战事到聚焦民生的转变,体现出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”(《孟子·尽心章句下》)的价值观。

在对宋战争中,有文人开始公开反对伐宋。杨云翼将包括南宋百姓在内的民众利益放在金王朝利益之上,“直言极谏,以为两淮生灵,皆陛下赤子,不能外御北兵而取偿于宋”,体现出生命至上的正义立场。文人们参加伐宋战争的积极性大为降低,军事上更是无甚作为。兴定元年,李献能、王良臣随军南侵,王良臣途中所作的诗歌居然是一派田园风光。正大四年,申万全去守卫盱眙途中亦作诗:“人生行止元无定,一苇江湖纵所如。”正大七年,金与南宋议和,王渥两次赴扬州均未能达成协议。这使其深入思考伐宋战争,难免有些生不逢时、误入歧途之慨。

在对西夏战争中,文人态度要积极一些。胥鼎曾移镇陕西,防御西夏有功。在与西夏谈判过程中,李献甫与夏使展开激辩,达成和议。元好问《西征壮士谣》透露出对反击西夏的支持。

金末与蒙古战争更为惨烈且最终导致灭亡,很多文人卷入其中。高宪从军,李纯甫写诗相赠,田琢从军塞外,赵秉文作《从军行送田琢器之》为他壮行。金末很多文人在战争中遇难。文人参军根本无济于事,有的士大夫原本就因为“签兵”制度而被迫入伍,既难以称职,又违其志。元好问曾入将帅完颜斜烈、移刺瑗的幕府,只创作出一些游览、饮酒、打猎之类的诗词,军事上并无建树。一败再败的战争彻底摧毁了文人抵抗反击的信心,金末文人对金蒙战争的关注点由战事转向民生。如赵元的《邻妇哭》满含血泪,表现民生苦难。其《修城去》真实记录了“百姓哀叹”。正大八年四月,军事重镇凤翔沦陷,百姓流离失所,雷瑄饱含热泪写下《商歌十首》。同时,元好问写下《岐阳三首》,关注的重点是遭遇不幸的“人海”。此后所作《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》等一系列名作,也是不离民生。

综合来看,战争对金代文学与南宋文学的影响有两大差异:第一,金宋战争给金代文学的影响比其对南宋文学的影响更小。金代前期的战争主要为金王朝主动发起的战争,金代文人厌战,即便战争取得胜利,也难以激发创作热情。第二,金代文学即使在蒙古入侵时,也没有突出地表现忠君报国、杀敌复国的理想。金代文人关注的重心逐步转向战争的受害者——百姓一方。无论政权如何更迭,“民为邦本”都应亘古不变,以天下苍生为中心的金末战争文学,突破了狭隘的李家赵家王朝的畛域,超越了敌对政权、交战各方的意识形态,为战争文学提供了一个范例。

■ 《社会科学战线》2021年第6期,约16000字